

穆欣欣以她在文学上和戏剧上的功力,在戏剧文学上找到了一个创新的突破口,一下子把澳门文学的格局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澳门作家讲 澳门“中国故事”

□张陵



1 “北京媳妇”澳门人

澳门作家穆欣欣散文集《文戏武唱》最近出版,之前她在内地还出版过《寸心千里》《当豆捞遇上豆汁儿》等集子。澳门的文学以诗歌散文为主,穆欣欣是其中最出色和重要的作家之一。她的散文随笔,有澳门散文共同的文化特征,也有自己的特色。

由于散文的主要发表园地报纸副刊特有的格局与优势,澳门的散文通常短小精巧,文字也洗练简洁,从容而温情地反映着澳门的现实,讲述着澳门老百姓日常生活点点滴滴的故事。自澳门回归后至今,已形成澳门散文独有的思想内涵及文化价值。

穆欣欣后来嫁到北京,成了地道的北京媳妇,过起了北京老百姓的日子,真实地体验着北京生活。因此,她的散文时比较北京与澳门,写两地生活的异同,也写两地文化的沟通。在散文集《当豆捞遇上豆汁儿》中,处处能读到这种比较。《这样的细节叫人温暖》一文中说:“我的居住地常在澳门和北京两个一大一小的城市更迭着,已无法说清楚自己更熟悉哪一座城市”。这样的生活和体验,是其他澳门作家所没有的。因此,作品对内地生活的反映更真实,也更有细节,更可感。

她从小生活在一个“戏迷”家庭里,长大后又在内地

2 《镜海魂》的示范作用及文学意义

在纪念澳门回归祖国十五周年的日子里,穆欣欣创作的京剧《镜海魂》问世。这是澳门文艺发展的一件大事情,更是澳门文学发展一个创新突破。回归祖国多年的澳门,经济社会得到长足发展,也到了可以期待产生自己的大作品的时候。这个历史性的机遇,落在了穆欣欣的肩上。

从当地出版的《讲述澳门故事——本土题材京剧是<镜海魂>戏里戏外》一书中,我们可以注意到,穆欣欣创作思想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她一方面继续用散文关注澳门的当代生活,一方面把自己的目光更深沉地转向澳门的历史,激活内心一种真正的“历史态度”。现在一般作家只看到澳门中西交流融合的文化,而穆欣欣则更深刻地看到四百多年殖民统治,给澳门带来精神文化伤害。她有一篇散文《年少时我们不懂历史》写道铜马广场澳门总督亚马喇雕像所折射出来的历史,实际上是透着殖民时代的罪恶的。而《与澳门的一次深度对话——我写京剧(镜海魂)》一文更是张扬了她进步正确的历史观。

与澳门历史的深沉对话,让穆欣欣对当年反抗殖民统治的村民沈志亮的事迹有了更深的认识和理解,看到他身上的反抗精神和英雄品格,这是殖民地非殖民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也表现了澳门这座城市的真正历史之魂。正是这个沈志亮,挺身而出杀死了无理抢夺村民土地的澳门总督亚马喇。然而,这个殖民主义者却被告作英雄立起了塑像,而真正英雄却惨遭官府杀害。被

大学里读戏剧专业的研究生,得到南京大学戏剧学博士学位。父亲穆凡中先生不仅是个“戏迷”,而且对中国戏剧有着很深的研究,是澳门文艺的评论大家。他多年鼓励支持穆欣欣利用假期专程到北京看戏,一看就是凡出十几出,有些经典剧目则反复看,反复品。可以说,穆欣欣在北京看的戏,比很多北京的北京人还要多,比很多北京更热爱京剧。在《文戏武唱》中的一篇文章里,她感慨道:“对我来说,能够天天看戏,才是梦寐以求的幸福啊”。这样的戏剧文化感悟的积累,也是她散文创作的重要资源。

记得穆凡中先生曾经说过,澳门是一座喜爱戏剧的城市。这种喜爱大约可以追溯到四百多年前伟大的戏剧家汤显祖到澳门后不久写下不朽作品《牡丹亭》。用穆欣欣《文戏武唱》里的话就是,汤显祖的到来,给了澳门一个“人戏”的机遇,澳门抓住了。从此,澳门这座城市就与戏剧结下了不解之缘。澳门人爱看戏,中西方的戏剧都在这里上演,几百年下来,澳门就成了爱戏之城,积累了悠久和厚实的戏剧文化。也许,穆欣欣在散文中的戏剧痴迷感悟和思考,除了有良好的家教之外,更离不开澳门丰厚的戏剧文化土壤的滋养。

歪曲的历史应该纠正过来。于是,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澳门人的形象,一个澳门历史英雄的形象,在作家心中酝酿出来,渐渐完整和升华。当选择用什么艺术形式表达的时候,穆欣欣毫不犹豫地她说:京剧。只有京剧的辉煌大气,才能配上这样的澳门人。这样的创作思想,正是新时代“中国故事”文艺观所倡导的,由此,《镜海魂》的创作打开了澳门故事走向中国故事的通道。

《镜海魂》的创作和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引发了强烈反响,也得到评论家的高度评价。事实上,《镜海魂》的脚本戏文,完全可以当作一部独立完整的戏剧文学来阅读欣赏。这里,有闻一多现代文学抗争不屈的人性力道,有汤显祖传统戏曲的优雅形式,有澳门人民历史创造意蕴。这一切,都在作家创作中融汇成一种独特的艺术个性,化为澳门文化相称的戏剧文学主题。穆欣欣以她在文学上和戏剧上的功力,在戏剧文学上找到了一个创新的突破口,一下子把澳门文学的格局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澳门只是一座只有四五



梁晓声书房 绿茶绘

梁晓声: 少年时候的阅读, 对人的影响根深蒂固

□文/图 绿茶

广泛看文学之外的书

梁晓声先生高产,从早期的知青题材《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年轮》,到社会分析著作《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2019年三卷本《人世间》获茅盾文学奖,2021年,新作《我和我的命》也引起广泛关注。

梁晓声先生家,每个屋子都有书架,他喜欢随时随地能拿起书来读,尤其晚上,必须读书才能睡着,读书就像生物钟一样。书架上的书,哲学、历史、法律、经济学,方方面面的都有。他说自己看书很杂,除了文学书,什么书都看,读书应该是跨界的,文学的书在阅读启蒙阶段及之后的大

阶段,可看的基本都看完了,所以,现在应该广泛看文学之外的书,既是对写作的补充,也是对形成自己丰富看法和认识的基础。

梁先生说 he 很少关注读者对自己的新书的反响,了结一本书,就进入下一本书的创作。现在做的事情,都是收尾的工作,把心里还有愿望写的,写出来。等这些小愿望都写完后,该退场就退场。找个地方住着,不再涉及任何文学的事情。

如今,他和小狗皮皮生活在郊区一栋民宅,读书、写作、遛狗,家人都住

在城里,儿子儿媳要上班,孙子要上学。

临走前,在梁先生客厅一角速写一张。梁先生问,“你画的这些书房将来要出书吗?”我说,“是的,正在制作中。”梁先生留言:“祝绿茶新书早日出版。”



梁晓声客厅一角

把写作当作一门“营生”

绿茶:您的阅读启蒙源自何时?对您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梁晓声: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过程,跟一切文艺都很远。当时,如果哪位同学家有收音机,我们会傻乎乎地在人家窗前或门外趴着听。所幸,那个年代还有小人书铺,看一本小人书一分或两分钱。小学期间,把周边的七八个小人书铺所有的书都看完了。这可以算是我的阅读启蒙了。

那个年代,大多数文学名著都改编成小人书了。还有电影版小人书,直接从电影上拓下来的。我记得当时看过一本《前面是急转弯》,讲的是,莫斯科一个青年科学家,他是所有人眼中的科学骄子,大家都崇拜他,都以为他荣,他也是最早有了车,每个周末从实验室回他的家,和自己的爱人约会。有一天回家的路上,下着雨,他发发现地上躺着自己人,显然是被车撞了。他下车看到那个人,伸出带血的手向他求救时,他犹豫了,他退回车里,绕了一个弯走了。当时没有手机拍照,也没有摄像头,没有第三者。

这件事在他心里留下很大的不安,但是很快就过去了,生活照旧。但是调查在进行,那个人没有死,他讲到有一辆车,曾经停下来过,有关方面了解后找到了他。这让大家非常惊讶,这么完美的一个人,居然见死不救。人设全面崩塌。这本书对少年的我,影响特别深。

我对这种涉及伦理的故事,印象特别深刻,至今都清晰记得。少年时候的阅读,对人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是重要的底色。对我们那代人而言,幸运的是那个年代印成小人的书,没有不好的。因此,可以无选择的开卷有益。

绿茶:知青年代,还有阅读生活吗?

梁晓声:知识青年多少都会偷偷带到兵团一些,他们带来的书我基本上全读了,有一本书叫《黑面包干》,写卫国战争时期饥饿年代,革命者怎么省下黑面包干给

孤儿院的孩子们,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绿茶:虽然经历那些年代,阅读生活没有间断真是幸运。

梁晓声:但真正的阅读,应该是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中文系有两个专业,一个评论专业,一个创作专业。我们有两个阅览室。其他系的同学想看,都是通过我们借出来给他们。那个时候是我读书最多的,废寝忘食,每天都待在图书馆里,看一切能看到的书。但即使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当时也没有张爱玲、林语堂、沈从文和胡适等。我是在80年代,接受了一次国外记者访问之后,很尴尬,才找来林语堂的书来读。

绿茶:大学的阅读经历,是让你走上文学之路的契机吧?

梁晓声:大学毕业分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之后,看了一系列电影,这个对我的影响很大。对于整个人类和文学和电影的关系,以及什么是好作品,什么是深刻,才有最初的认识。这时候,我的短篇已经获过奖,身份上已经被认定是作家了。

那时候,我们每个星期去电影资料馆,从电影的源头看电影,从一分钟,两分钟,半个小时到三个小时的,黑白电影这么一路看过来。电影伴随着的西方现代主义的步伐,不同时期的电影都有表现。电影中对于深刻的表现往往比小说更直接,更深入人心。

绿茶:小说,或者其他文艺作品的深刻性不能和电影相比吗?

梁晓声:当然不是,不同文艺作品都在深刻性上有自己的表现。比如戏剧《等待戈多》,说实话当时看不懂。如今,我再回想这个剧,有一天晚上我突然明白了。人类文明发展了几千年,很多东西都变了,但有些关键的因素始终没变,就像流浪汉脱下鞋子,抖了抖沙子。

再比如,法国雕塑家罗丹,他大多数雕塑都很著名,但有一件雕塑很少有人关注,一个小小的希腊神话中

的“人马”。这个雕塑中,人的上半身向上努力地挣扎,扭动着腰部,伸张着手臂,脸上呈现痛苦的表情。原来也不明白怎么回事。现在联系读过或看过的一系列深刻作品后理解了。

再联想诺贝尔奖作品《蝇王》。飞机失事。荒岛上的八人分成两派,开始有领袖,有领袖,势不两立。显然也是人马主题。电影《出租车司机》,也是讲人马状态。还有《第二十二条军规》《1984》等等。

看完这些我们再来谈深刻,没有超出我们对深刻的理解。而我们现在很多作品还停留在对人性的深刻探讨,就显得很可笑。

绿茶:有了那么多深刻的作品,今天我们的文艺作品还能做什么呢?

梁晓声:在今天,一个写作者,想要用小说来证明自己多么有才华,在我看来是可笑的。如今的小说要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和价值,很明显,如今的文学已经不可能像启蒙时期那样,像闪电一样给人留下深刻影响。小说现在已经不需要承担那么大使使命了,回到他最初的样子,就是生活的一种需要。我依然觉得小说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很有必要,可以延伸出电影、戏剧,可以把人类需要面对的一切问题,通过小说或影视化的形式呈现出来。但是这个作用,也没必要夸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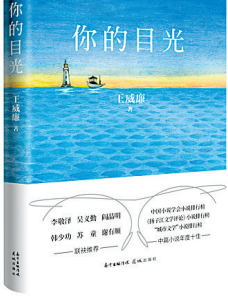
写作这件事对我来说,让退休的日子有事情可干。我把写作这件事当作泥人张,有一门自己的营生。最终还是回到,人还是多读一些书好,尤其到了晚年,你读过的书能让自己有事可干,还激发你能写,这日子就满满的了。

我现在做的所有事情,都是收尾的工作,是准备退场的事。到目前为止,我心里还有愿望想写的,就把它写出来。写完后,该退场就退场。人生到了现在,其实是不断的卸担子,人这一生,身上背的担子太多了,有些是生活强加的,有些是自己给自己加的。我现在的写作,就在做不断卸担子的事。

王威廉的小说创构了一种现实主义的抒情美学,在广泛意义上也属于一种成长小说的文学类型

大湾区青年的 “度过”与创造

□蒋述卓



青年小说家王威廉最近发表的中篇小说《你的目光》写的是湾区青年创业与奋斗的故事:一个开眼镜店的小伙子与一个眼镜设计师的女青年从碰撞到结合。与他以往小说不同的是,这次他的故事及其叙述都不先锋,而是老实实在地讲一个故事。

小说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打开故事的对话框。普通又普通的深圳青年何志良有过网瘾,在网络上谈过无终而疾的五年恋爱,还得疗愈情伤。快四十岁的他在横岗的“国际眼镜城”开了一家眼镜店,却幻想着要设计眼镜。他在他的店里遇上的香港学设计回到广州要设计自己的眼镜品牌的洗姿琪,就要拜她为师。开始是微信上教学,继而是到广州去当面求教。他们都有不同的生存障碍,但在相逢相倾相知的过程中,在眼镜设计事业上的相互促进,对抗孤独,实现对孤独的“度过”。

在文体上,王威廉做了新探索,他将阿良的日记和他想设计的眼镜型号以及洗姿琪的设计实践巧妙地镶嵌在小说中,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从而突出了他们两人在创业上的相互支持及成功。

王威廉是一个很有哲学思辨的作家,正如他的《野未来》一样,他总想将小说的思想写得富有思想和哲理。《你的目光》也是如此,作者通过阿良的日记表露出诸多带有文学性与哲理性相融合的金句。如阿良在陪阿姿疗伤的日子里,有了对如何熬过艰难的体会,关于如何理解“度过”,作者不惜花费大笔墨进行阐释:“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需要度过;一件又一件事情,我们都需要度过;再到人的一生,我们也要度过的。”阿姿的哥哥出事,对于阿姿的母亲来说,就是一次度过;阿姿的母亲患上阿尔茨海默病之后,又是一种度

过;当她幻想着回到了儿时,跃入水中之际,也是一种度过;当阿姿承受着母亲的离去,靠酗酒化解这种悲伤的时候,还是一种度过。”阿良还用诗进一步诠释“度过”,说的因为我们现在到未来,从这里到那里都一无所知,充满恐惧,所以才“恐惧于度过是必然,恐惧于此心无法度过”。

阿良在知道阿姿是因为母亲突然离世而不肯见他,只好到珠江江边散心,看到江上的薄雾以及薄雾中的小蛮腰而对为什么要设计眼镜有了感悟:“设计眼镜,大多数时候都是为了让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个世界,但是人们为什么会对黑暗恐惧呢?仅仅是为了过滤强烈的阳光?显然不是。就像我之前说的,眼镜也在遮挡着什么,通常是让别人看不清我们。不过有时候,譬如此刻,我们也需要这样一款眼镜:让我们即使在能够看清事情残酷真相的时候,也能人为地将其放置在雾气弥漫的保护之中。”——眼镜需要薄雾,是因为后面隐藏着深渊。当然,阿良与阿姿的目光最后融为一体了,这合体的目光不仅让他们看清彼此的小世界,更看清了宏阔的大世界。这便是阿良日记里写到的,“时代需要一副大眼镜,才能看清那个野未来”。

当然,王威廉对小说哲理的追求太执著,有时未免太过。小说写到阿良与阿姿的“度过”其实就可以,不必再去牵扯到“心安”。他们既然有了“度过”,才有了“开始”,不正是“心安”的表现吗?更何况他们的未来与发展并非一个“心安”能包容得住的。要继续创业,就肯定还会有新的挑战,新的苦恼,乃至还有新的障碍需要去继续征服与度过。

小说的结局自然是圆满的,除了阿良与阿姿结为良缘之外,阿良的妹夫、从大西北来到深圳创业的陈春秋成了制造无人机的“程序猿”。小说创构了一种现实主义的抒情美学,在广泛意义上也属于一种成长小说的文学类型,尽管其中表现出一些淡淡的哀伤和忧郁,但在“度过”的过程中却实现了心理上的蜕变和精神上的蝶变,有了一些雄阔和激昂的气象,在文学地理学的构建中表达出一种“新南方文学”的诗学意蕴。

在面对“伪历史主义”“虚无主义”“精致利己主义”时,能厘清三观,正视大道,明晰前行之方向

令人动情的 现实主义抒写

□曹峻冰



有《晏阳初全集》《晏阳初传》《告于人民》《晏阳初传略》等书问世,但只有《晏阳初》以传记文学的手法来描摹晏阳初的一生,在文体层面别具新意。

较于寻常自述传记或他撰传记,《晏阳初》的传主本事有较强的故事性、趣味性:既有自然风物的诗性再现,也有亦俗亦雅的情景对话,以及对矛盾冲突、困难阻碍的描写。其用合情合理的文学性想象与大量颇富新意的细节生动再现了晏阳初的生命历程——从幼时启蒙到年少离乡求学,从学成致用到大展宏图,从国内定县试验到异国帮扶。因翔实史料、鲜活情境与诗性语言的有机相融,晏阳初胸怀苍生、矢志不移的高大形象跃然纸上:1918年自告奋勇赴一战战场为中国劳工服务,至1990年病逝于美国,七十余载,始终未脱中国国籍的他,一直在践行其当年回国时的初心:不做官,不发财,为推动平民教育、开启民智、建设新式乡村奉献一生。

晏阳初说过:“我确是有使命感和救世观:我是一个传教士,传的是平民教育,出发点是仁和爱;我是革命者,想以教育革除邪恶败俗,去旧创新,却不主张以暴易暴,杀人放火。……我相信‘人皆可以为尧舜’。”苗勇将其人格与精神概括为三点:讲好中国故事的先行者、国内乡村教育建设的领军人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者。回首其人生历程,晏阳初确乎践行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句中国古训。《晏阳初》以坦诚、朴素但令人动容、动容的现实主义抒写,讲出了也讲好了属于民族、人类、未来的中国故事,在面对“伪历史主义”“虚无主义”“精致利己主义”时,能厘清三观,正视大道,明晰前行之方向。